

# 蓬溪起义与南昌起义比较研究

代秋彬

(中共遂宁市委党校,四川遂宁 629000)

**[摘要]**蓬溪起义是红军早期将领旷继勋在四川蓬溪举行的军事起义,与举世震惊的八一南昌起义相比,旷部面临的斗争形势更为严峻,领导机构相对不够成熟,军事实力不如南昌起义声势浩大,影响力也相对限于西南地区。但蓬溪起义在加强军队中党的组织建设、锻造纪律严明的人民军队、密切联系工农群众开展群众运动方面有一些优良做法,有助于宣传革命主张,唤醒长期处于反动统治中的广大群众。虽然蓬溪起义和南昌起义都最终失利,但都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对于我们再思考加强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性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旷继勋;蓬溪起义;南昌起义;对比

**[作者简介]**代秋彬(1992—),男,四川安岳人,中共遂宁市委党校讲师,哲学硕士,研究方向:党史党建、文化哲学。

**[DOI]**<https://doi.org/10.62662/kxwzx0203014>

**[本刊网址]**[www.oacj.net](http://www.oacj.net)

蓬溪起义是中共四川省委指导进行的、继泸顺起义后又一次对西南地区产生较大影响力的起义事件,虽然其对反动统治的打击和影响力与南昌起义难以相提并论,但在四川军阀割据的环境下,蓬溪起义在打破白色恐怖、宣传革命主张、唤醒民众开展革命斗争、呼应外地红色力量等方面有重要意义。本文对蓬溪起义和南昌起义的历史背景、领导机构、敌我军事力量对比、群众基础、起义影响力及意义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两次起义的异同点,倡导继承共产党人在艰苦环境下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并结合研究成果总结启示并提出建议。

## 一、蓬溪起义和南昌起义情况概要

### (一)蓬溪起义概况

旷继勋烈士领导的蓬溪起义是在全国深陷白色恐怖和四川军阀混战的历史背景下,中共四川省委指导进行的震惊全川的重要起义,虽然它历时短暂,但起义的璀璨光辉却照亮了深陷黑暗的西南大地,在革命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本文参考旷继勋研究著作和遂宁、思南等地现存的党史档案部门资料,梳理出蓬溪起义主要脉络。蓬溪起义又称“遂蓬边界起义”,是1929年6月在四川省委直接领导下的红军高级军事指挥员旷继勋在蓬溪县大石乡牛角沟领导的军事起义。这次起义的主体是隶属军阀邓锡侯的黄隐部江防军第七混成旅全体官兵,通常认为有四千余人,另

有一说是两千多人。起义前中共四川省委派罗世文、邹进贤到部队参与筹划起义工作,并在起义后向各级党组织印发了《为江防军第七混成旅兵士举行革命兵变的宣言》,宣传动员广大党员和群众支持起义。起义军攻克蓬溪县城并建立了四川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后又在南部县重镇新政镇建立了新政县苏维埃政权。起义部队自制了旗帜、帽徽、臂章等标志用品,起义后更名为“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起义历时一个月有余,行经西充、南部、新政、营山、渠县、大竹、梁平、达县等十二个县,转战一千多里,七月底进攻梁平猫儿寨时受重挫,残部在转移至达县碗厂沟一带又遭遇反动军阀拦截,被缴械解散。

### (二)南昌起义概况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分国民革命军于1927年在南昌发动的起义。当时正值蒋、汪叛变革命,开展所谓“清党”运动,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国民党反动派大肆迫害共产党人,大革命失败的阴影和白色恐怖笼罩全国。

一系列突变让共产党人认识到必须建立自己的军事武装,以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综合权衡后,中共决定在南昌策动有效控制和影响的贺龙、叶挺、朱德等部国民革命军发动起义,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起义部队共计约2.3万人,当时南昌城驻防的反动武装约三千人,但江西、

广东各地反动武装多达十余万,因此占领南昌城后进行了短暂的部队整编,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并联合国民党内一些开明人士发表了《中央委员宣言》,揭露蒋、汪的反革命行径和本质,表明继续革命的决心。起义部队于8月3日撤离南昌,按计划南下开进潮汕地区与当地革命力量汇合开辟根据地。起义军南行过程中经赣州、会昌、瑞金,9月初受重兵阻截,前委分析形势后决定转经福建长汀、上杭,9月下旬南下广东大埔县,10月初在大埔县三河坝分兵断后,主力挺进潮汕。后因国民党反动武装重兵围剿,主力部队战斗失利转战海丰、陆丰地区。留驻大埔县三河坝断后的第25师在饶平县与撤出潮汕的第三师残部汇合,此时起义军已对国民党反动武装缺乏实际威胁。朱德部后辗转开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共同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这次起义建立了党领导的第一支武装。自8月1日宣布起义到10月初起义军遭受重挫,起义主要阶段历时两个多月,转战江西、福建、广东三省,给国民党反动统治以极大的打击,表明了中共革命到底的态度和信念,为武装斗争和建设革命根据地积累了宝贵经验,保留了革命火种。

## 二、蓬溪起义和南昌起义各方面比较

### (一)历史背景

1929年蓬溪起义时,国民政府已经控制住全国局势,四川军阀内部先后发生了“八部同盟”与刘湘和刘文辉之间的战争,战后实力尚存的军阀刘文辉、刘湘、邓锡侯、田颂尧、刘存厚等表面上支持国民政府,暂时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另外,之前两年四川爆发过泸(州)顺(庆)起义,而且全国范围内爆发过南昌起义,中共领导的事件引起了四川军阀对红色革命势力的警惕。史料显示,1928年邓锡侯和黄隐将旷继勋所在的第七混成旅调驻昭觉寺整训,又派其参加针对刘湘的下川东之战,都是因为察觉到旷所在部受革命思想影响较深,顾忌其对省会不利,密谋削弱该部实力。这体现出当时四川军阀对旷旅有所警惕和关注,这于旷旅的起义不利。

南昌起义比蓬溪起义早约两年,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大革命,执行所谓“清党”,主要重心是从政治上迫害共产党人,对自身军队中的红色因素关注相对较少。贺龙、叶挺、朱德等在国民革命军任职却又受红色思想影响较大的军官虽然受到了一些怀疑,但在国民党左派军官、时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的帮助下没有完全暴露,得以在南昌起义时发挥主要作用。另外,北伐战争刚进行了一年

时间,国内多数人关注的焦点在于国民革命军与北洋军阀之间的战争,这个大背景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国民革命军内部分化的情况。

因此,从历史背景上看,蓬溪起义的江防军第七混成旅与南昌起义的武装力量相比,党组织暴露时间长,所处的军事政治环境相对稳定,因此受到反动势力关注较多,总体形势比南昌起义时更严峻。

### (二)领导机构

从领导机构看,蓬溪起义隶属中共四川省委领导。当时四川省委处于地下工作状态,派时任宣传部秘书罗世文、巡视员邹进贤赴旷部组织策划起义,起义的特别委员会实际领导核心即邹进贤(特委书记)、罗世文(党代表)、旷继勋(总指挥)三人。然而罗世文、邹进贤和旷继勋的党龄都不长,罗、邹是1925年入党,旷是1926年底入党。参加斗争的经验也不够丰富,罗、邹之前在党内担任的工作是发展团、党组织,旷则是以军官身份掩护和接纳各地汇集的中共党员,三人对于党的理论、指导思想的学习和运用没有受到系统训练,也没有专门的组织工农运动的经历,对于发动工农革命、进行武装斗争的精神实质的理解尚有不足。旷在当时虽然已经行使第七混成旅旅长职权,但是在1928年底旅长刘丹五离队的情况下代理旅长职务,实际担任旅长职务的时间不长,在队伍中威信还未完全树立,以至于在起义之前有的营长向黄隐、邓锡侯告密,这说明军队中的思想不够统一。

另一方面,省委和旷旅对起义的准备筹划和斗争经验也有所不足。根据《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的资料,旷旅从当年5月就已开始向四川省委申请批准起义,但省委一直认为起义的时机不够成熟,没有正式同意旷旅的申请。省委的考虑主要有两方面,即群众革命积极性不强和党在部队中的组织领导作用不够坚强有力,建议利用一切可能延缓时间,同时也指示反动当局决意要破坏军队中的党组织时,可以发动起义。省委的判断是正确的,但低估了反动军阀破坏旷旅党组织的恶意,也没有直接有力地改善旷旅所处环境,主要发挥指导的作用而缺少实际帮助,虽然在起义后即向全川发布了《宣言》,但因四川各地党组织力量薄弱,实际收效不大。省委和旷旅的军事计划是联合以李树骅为司令的“农村警卫司令部”会攻遂宁,南下合川联合陈书农部沿渠河北上取达县、宣汉,但起义打响后才因李树骅临阵变节而改变计划,临时决定围攻蓬溪后东进谋求与川东北李家俊部或鄂西贺龙部取得联系。计划的不周密、起义后立即调整军事计

划,对行动极为不利。在过新政之后,又改变行军计划转向南进谋求开辟梵净山根据地,而得知刘湘封堵了南下渡江线路后临时改道北进开江,也是步步被动,以至于曹仲勤(一名曹仲英,起义部队政工人员,旷继勋秘书)回忆时称“起义后,向何处走,不但我们这样的中级干部茫然,连继勋同志也是茫然的”。后又在情况不够清楚、情报不够可靠的情况下贸然攻打梁平的猫儿寨,导致了决定性失误,这些都说明蓬溪起义领导层相对而言缺乏斗争经验、不够成熟。

南昌起义的领导层为中共中央,据可信史料,中共中央在当年七月进行了改组,决定通过策动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发动南昌起义,并指定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组成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实际执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主要领导为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其中,周恩来在1926年底已经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当时贺龙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叶挺为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朱德为第五方面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刘伯承被武汉国民政府授予暂编第十五军军长,为筹备起义称病离职,但他刚组织过泸顺起义,是直接斗争经验最丰富的人。这几位中除了贺龙之外均已具有数年党龄并且在党内工作职务不低,从事的工作也长期与武装暴动、军事指挥、工人起义相关,工作经验比较丰富。综合以上情况看,南昌起义的领导团队明显更加善于筹划和发动军事斗争,制定了详细周密的准备工作和明确的短、长期目标,这是南昌起义得以发展扩大的重要保证。

### (三)敌我双方军事实力对比

蓬溪起义时旷继勋所辖第七混成旅全旅共计四千余官兵,据起义时任旷旅的四团团长陈茂甫回忆,当时全旅官兵为四千余人,其他包括《解放军将领传(第一集)》和网络上通行的大部分信息均认可这一数据。但也有一些观点认为起义部队有两千余众或三千多人。本文较赞同据当事人回忆的全旅官兵四千余人起义这一说法。起义地点附近,敌方部队主要驻扎在遂宁附近。据蓬溪县志的数据,当时遂宁驻扎敌人11个团,而蓬溪县城仅有一个不足一千人的骑兵团驻防,因“农村警卫军司令”李树骅以各种借口不配合原定的起义行动,旷部临时改变计划,避实击虚,先攻取蓬溪然后向东行进。当时驻防遂宁的军阀为隶属邓锡侯的李家钰部,川东地区主要的军阀有驻防顺庆、广安一带的罗泽洲部,驻防现德阳、绵阳及以北全境的田颂尧部,驻防达县和通江、巴中、通江等地的刘存厚部,驻防今重

庆大部分地区的刘湘部。从军事实力上讲,在旷部计划行经的路线上有十余万反动军阀武装,因此主要采取穿插军阀势力防线边缘的策略,避开了顺庆(南充)、达县(达州)等中心防区,这在客观上有利于保存力量、宣传革命,而且革命队伍也的确在有限的规模内有所扩大。但核心力量在经过猫儿寨激战后损兵折将,标志着起义转向失败。旷部的士兵受党的领导时间长,革命思想影响较深,军纪较严,这与旧式军阀差别较大,而旷继勋有十三年军旅生涯背景,又以能征善战出名,这支队伍本身的战斗力是较强的。旷部的作战计划应按照国家军委在6月28日的回电中嘱咐的“形成游击战争”,旷部前期的避实击虚策略也的确有效。但起义的转折点出现在过渠河后行军计划的频繁变动和强攻猫儿寨失利上,猫儿寨本驻防了一个旅的兵力,加上地方民团武装,起义军的兵力明显处于劣势,加上敌人以逸待劳,又有天险可据,本应周密计划获得可靠情报才能进攻。但起义军领导层过高地估计了寨内党的地下组织的作用、粮食弹药补给以及部队战斗力,冒险发动强攻。地下组织因被破坏没能呼应打开寨门,起义军虽然英勇,但在疲累饥饿又无险可据的绝对劣势下,两次进攻均以失败告终。这反映出领导层对于游击战术的精髓领悟不够、战术素养不高的问题。另外,省委和旷部制定的东进鄂西、南下梵净山、北上开辟通南巴三个方案中,最现实的应该是北上路线,但所见的资料中基本未见李家俊部游击队与旷部联络,也一直没有很好地支援旷部,甚至在旷部残部到达开江、达县境内(毗邻李家俊部游击区域)时也没有适时增援,最终起义部队全编制覆灭。

南昌起义的起义部队包括贺龙的第二十军全部、第十一军的叶挺第二十四师和蔡廷锴第十师、朱德的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共计两万余人,起义时面临的敌军为第五方面军警备团和第三、六、九军各一部共三千余人。八月一日,起义从凌晨两点战斗至拂晓结束,全歼守军,占领南昌。起义爆发后,国民党反动派令朱培德、张发奎等部数万兵力围攻南昌。八月三日,起义部队陆续撤离南昌,南进广东。当时江西、广东一带国民党反动武装还有李济深、唐生智、程潜等部,合计近十万人,南昌起义的人数虽然比蓬溪起义的人数多数倍,但面对的敌人也多出自己数倍,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因此也寻潮汕、海陆丰等偏远和已有革命队伍的地区进发。行军过程历时比蓬溪起义时间长,战斗也更频繁和激烈,截止朱德的25师从三河坝到饶平与主力部队残

部会师,行军历时两个月有余,大小战斗十余次,主要的有任田、瑞金、会昌、三河坝、揭阳等地发生的战斗。起义军连挫敌军,取得了多次胜利,尤其是三河坝阻击战这样重大的胜利,体现出军队领导层具有较高的军事素质,士兵也比较有战斗力,部队的战斗意志较强,这个方面比蓬溪起义更具优势。南昌起义的另一个重要的结果是保存了约八百人的革命部队,没有被全编制消灭,为以后革命事业的发展保存了重要力量。但南昌起义部队与蓬溪起义部队相比有一个重要的弱势面,即整军工作不够到位,部队非战斗减员情况严重。起义不久后,蔡廷锴将其部第十师数千人脱离革命队伍,先后的零星脱队人数较多,真正参加任田、瑞金、会昌等战斗的只有约1.3万人。

从总体上看,南昌起义部队无论从人数还是领导层的军事素养上看,战斗力都要比蓬溪起义部队更强。但就敌我力量对比来看,蓬溪起义和南昌起义的敌我力量对比都是敌强我弱、众寡悬殊,采取了相似的夺取边区、汇合已有革命力量的军事策略,但蓬溪起义的行军时间和战斗的次数比南昌起义更短更少,而南昌起义的部队构成不如蓬溪起义的纯粹,出现过一些脱队状况。

#### (四)群众基础

蓬溪起义前,四川省委的指示一直是加强发动工农群众对革命的积极性,争取工农群众的支持,而旷部由于受党的影响,又建立了党的组织,部队的纪律比较严明,起义时和行军过程中比较受群众拥戴,这在客观上是有利于起义的。根据目睹过旷部起义的蓬溪县大石镇牛角沟村村民苏龙宝回忆,他们村的青年想要离近一点看起义的部队,有一名士兵说他们的事让他们回家去,“但他的态度是和蔼的,不像李家钰的兵那么凶”。根据红一师参谋长杜泽文于当年十一月提交的作战报告,部队到达南岳场后,当地农民同志帮助侦探消息、办理米食,场上群众交口夸奖红军好,骂军阀刘积之的部队的不是。据解放前的《蓬溪近志》载:“旷部虽一日之扰,而情势甚险,犹幸纪律颇严,公家虽饱受损失,尚无一兵敢入民房携取财物者。”《新四川日报》民国十八年八月四日篇说起义部队“沿途不骚扰平民”“宣传颇力,多受人民欢迎”“沿途依附日众”。根据众多史料记载,部队抵达新政后召开了万人群众大会,这是宣传、组织群众的重要举措,还于七月三日到达流马场后惩处了恶霸范海鱼及其狗腿子帅世光,人民群众拍手称快等事迹也说明部队深受人民群众欢迎。据曹仲勤回忆,他在碗厂沟被重兵

围困之际也是依靠达县参军农民的救援才冲出敌军重围的。这些都说明蓬溪起义的旷部纪律严明,与人民群众关系较为亲密,在群众的心目中有良好印象,群众工作有一定成效。

南昌起义的群众工作相对薄弱,当时党内“左”的思想还比较严重,发动群众走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还没被确立为指导思想,领导层的工作重心在抓好部队的军事斗争上,尚未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根据可见的资料,在转战赣南、闽西、粤东地区的过程中,并没有发动很有效的群众运动,只有抵达潮汕、海陆丰地区后与当地原有的革命武装有一定的交流整合。聂荣臻元帅在晚年回忆南昌起义时认为当时不应南下广东“整合革命力量,再次北伐”,而应“面向农民,与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我们就能够推动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这种思路与毛泽东同志的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相近,如果当时能在南昌起义领导层中更彻底地减轻“左”倾思想影响,采取这一策略,革命力量有可能提前发展壮大,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发展。

由此看来,南昌起义的群众基础比蓬溪起义相对薄弱,这与南昌起义后党在两年的斗争中探索出的革命规律、工农武装割据的路线、群众工作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党内一致认同有密切关系。

#### (五)起义影响和意义

蓬溪起义在四川历史上创造了许多第一次,如第一次建立了县级苏维埃政权、第一次出现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转战千里的壮举等,打击了反动军阀和封建官僚地主阶级在四川的统治,有利于宣传共产党的革命主张,组织和唤醒群众,在四川播种了革命的种子,推动了四川革命形势的发展。从大局看呼应了川东北李家俊游击队的革命运动,一定程度上声援了鄂西地区贺龙部建设和扩大革命根据地。起义虽然最终失败了,但许多共产党员深入各地继续开展兵运和群众工作,间接促成了1930年的江津起义和广汉起义。据蓬溪县志资料记载,在北京朝阳大学肄业入党的王武林、蒋瑞琪、刘孔庸目睹了旷部的起义,其后接南充中心县委委员苏俊到蓬溪发展党团组织,先后发展多名党员,夺取了蓬溪的教育大权;旷部起义时任营长的罗南辉在起义失败后还参加了第二混成旅在广汉举行的起义。进攻猫儿寨失利后,旷继勋请示省委:“部队失败后怎么办?”省委答复说:“这次起义的政治影响很大,军事上失败了政治上也是胜利的。”这些都说明这次起义对于动摇四川地区的军阀黑暗统治、宣传革命发

动群众有重要意义。

南昌起义的影响力波及全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军队武装起义,极大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建立了属于自己的革命武装。用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表明了共产党革命到底的决心和意志,给想要继续革命但苦无门径的中立人士和广大受苦难的工农群众点燃了新的希望。起义军在转战过程中积累了大量战斗经验,锻炼了革命队伍,培养了许多在之后系列战争中发挥核心作用的军事人才。起义最终虽然归于失败,但保存了一支由朱德、陈毅领导的队伍,辗转后开上井冈山,开辟了最早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对于探索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适合中国革命的道路有重要意义。

### 三、总结与启示

蓬溪起义和南昌起义已经过去九十余年光景,遥想当年,有志之士集聚一堂,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旧军阀的腐败统治,为救民众于苦难的深渊,为挽中华民族大厦于将倾的危难,不惜流汗、流泪甚至流血牺牲,用青春和生命翻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他们的起义用实际行动为党和军队的成长积累了经验,使越来越多的党内同志由衷认识到,在中国开展革命必须结合中国实际,发动工农群众开展土地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传播了革命理念,唤醒了民众,向广大中立的国内外仁人义士揭示了国民党反动派和旧军阀的丑恶面目,为之后革命事业的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

研究比较两次起义的各方面要素,有助于我们从另一视角更深刻地认识两次起义的价值意义。无论是蓬溪起义还是南昌起义,都是中国共产党人早期的艰难探索,都是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宝贵经验。两次起义都是先烈的英勇付出为革命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尤其是与两次起义都密切相关的群众工作问题,启示了我们党任何时候都必须密切联系群众,保证党和群众的“鱼水”关系,让党的根基深入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向群众学习、为群众服务。我们必须在新时代背景下继承和发扬先烈们不畏牺牲、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担当服务人民、复兴民族的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继续奋勇前行。

### 参考文献:

- [1] 于元. 100 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旷继勋[M].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1: 16-21.
- [2] 林正. 南昌起义(资料)[EB/OL]. <http://www.81-china.com/product/344.html>, 2018-2-25.
- [3] 中共遂宁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遂宁市党史资料汇编[M]. 1989: 73-77.
- [4] 本书编写组. 解放军将领传(第一集)[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84: 370, 373.
- [5] 中共思南县委党史研究室. 红军虎将旷继勋[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7: 14, 40, 41, 43, 51, 57.
- [6] 聂荣臻. 南昌起义[N]. 人民日报, 1983-7-27(5).

## Comparative Study of Pengxi Uprising and Nanchang Uprising

DAI Qiu-bin

(Party School of Suining Municipal Committee of the CPC, Suining Sichuan 629000, China)

**Abstract:** The Pengxi Uprising is a military uprising held by Kuang Jixun, an early general of the Red Army, in Pengxi, Sichuan Province. Compared with the Nanchang Uprising, which shocked the whole world, Kuang was faced with a more grim situation. The leading institutions were relatively immature, the military strength was not as powerful as the Nanchang Uprising, and the influence was relatively limited to the southwest region. But the Pengxi Uprising has some good practices in 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organizational construction in the army, forging a disciplined people's army, and carrying out mass movements in close contact with the masses of workers and peasants. It helps to promote revolutionary ideas and awaken the masses who have long been in reactionary rule. Although both the Pengxi Uprising and the Nanchang Uprising ultimately failed, the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volutionary situation, which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us to rethink the importance of 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mass work.

**Key words:** Kuang Jixun; the Pengxi Uprising; the Nanchang Uprising; comparative study